

2019
考古
调查

透过陶俑看唐朝时尚 女骑手穿长靴罩面纱戴帷帽

本报记者 商越

核心提示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4件神态各异、英姿飒爽的唐代骑马女俑。可以看出,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女子骑马成为一种风尚。从这4件骑马女俑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女骑手的“标配”:长靴、长裤、胡服,外加一顶由丝绸之路传来的时髦帷帽,让今人更立体直观地领略到唐代女性的精神风貌和大唐盛世的气息。

宝藏辽宁
BAOCANGLIAONING

朝阳唐代高官墓 出土6件骑马女俑

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4件活灵活现的唐代骑马女俑,一件是朝阳唐代孙则墓出土的釉陶骑马女俑,通体施淡黄色釉,女子发前部刘海中分,嘴角含笑,表情端庄,身着披巾,内衬低胸襦衣,下着长裤,脚尖尖顶靴;一件是朝阳唐代鲁善都墓出土的彩绘陶骑马女俑,只见女子头梳双环望仙髻,弯眉细目,上着对襟短襦衫,下着红色长裤,足蹬长靴;第三件是河南省博物馆馆藏洛阳出土的唐三彩骑马女俑,女子头梳高髻,着窄袖翻领襦衣,肩搭披帛,下穿长裤,足蹬软靴,神情从容淡定;第四个是旅顺博物馆馆藏新疆出土的泥塑彩绘骑马女俑,马背上的女子也是发髻高绾,面涂白粉点红唇,下身穿着白棕色相间的竖条纹裤,勒紧前视,神情悠然高贵。四匹马都是身形健壮,鬃毛整齐,精神抖擞,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唐代仕女出行的真实样貌。

朝阳博物馆副馆长韩国祥告诉记者,釉陶骑马女俑是2003年从孙则墓中发现的。当年的考古人员对朝阳市纤维厂原址基建工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这里是唐代孙氏家族墓,共有17座砖室墓葬,是目前朝阳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唐代家族墓葬,墓地出土文物有数百件。其中孙则墓位于墓地中部,是整个墓地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墓葬,且保存相对较好。

据孙则墓志记载,孙则生前任职大多在营州(今朝阳)地区,最初任辽州总管府典签,为九品或从八品。后升为参军、北黎州昌黎县令、松漠都督府长史、明威将军本府折冲都尉等官职,从九品典签逐步提拔为正二品上柱国。唐永徽六年(655年),孙则去世,终年67岁。

从墓志中可知,孙则生前官职较高,地位显贵,因此墓葬规格也很高。从墓室规格来看,孙则墓由祭台、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从出土遗物来看,孙则墓尽管早期被盗,但随葬的遗物还是比较丰富,有瓷俑、瓷器、陶器、唐三彩残片、铁器、皮革等几类。墓室前部中央还发现墓志一合,出土遗物150多件。其中人俑86件,镇墓神煞俑4件,大型驼俑、马俑7件。另外还有6件骑马女俑,有4件女俑戴着帷帽。

朝阳在唐代称营州,唐初在朝阳设营州总管府,唐武德七年升营州都督府,是唐朝在东北设立的唯一的中原州治,并统辖北方和东北七州兼平卢节度使治所,是唐王朝在东北首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中原王朝与东北及东北亚文化相互交融的枢纽之地。正是由于营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唐王朝因此派遣大批的军人到营州戍边,其中也有一些高级官吏,孙则就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朝阳地区唐代墓葬近250座,在时间上基本都属于“安史之乱”之前,也就是从初唐至盛唐时期。这些朝阳境内出土的唐代遗物,印证了朝阳在唐代的历史地位,同时也反映出朝阳虽在东北,但是仍然与中原的经济文化发展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唐三彩骑马女俑



唐泥塑彩绘仕女骑马俑



孙则墓出土的戴帷帽骑马女俑



新疆唐墓出土的戴帷帽骑马女俑



陕西唐墓壁画中,侍女手捧一顶帷帽

骑马必备:戴帷帽缀网纱遮住靓妆

“孙则墓出土的戴帷帽女俑,帽檐边缘一周有凹槽,可用来缀网状面纱。”辽宁省博物馆助理馆员马卉告诉记者,这些帷帽呈扁体圆形,正面有圆乳状凸起,这种帷帽的造型,一般认为是由幂篱改造而来的。

据文献记载,幂篱,也称“大头长裙帽”,类似现代的斗篷,最早起源于古代阿拉伯地区,因为当地多风沙,日照也很强烈,人们为了防风沙、遮阳防晒,就流行戴起了幂篱。当时是男女通用,长可障身,后来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其传播者应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经商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和西域商人。

传入中原后,幂篱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因为内地没有那么多风沙和暴晒的烈日,但是,它却可以实现封建礼制不欲妇女抛头露面的要障蔽的目的。因此,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幂篱成为宫廷妇女和王公贵族出行途中,防止被人窥视的障面用具,在南北朝末年和隋代、初唐迅速流行起来。虽然幂

篱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穿戴以后既不方便,又很笨重。于是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一种经过改进的帽子逐渐开始流行,这就是“帷帽”。

马卉说,唐时的帷帽多用藤条或席片做成帽形的骨架,糊裱缙帛,有的为了防雨会刷上桐油,然后再在它的檐上加缀一圈长度到颈部位置的纱网,就成了帷帽。这种缩短了幂篱,暴露了身体,但仍遮盖着五官,用意还在于遮盖面部。到武则天时代,戴帷帽的流行时尚达到了顶峰,也成为当时营州女子外出时非常喜欢的帽饰。孙则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就再现了营州女子头戴帷帽骑马出行的情景。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初,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年),“官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650—655年),“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武则天之后(684—704年),“帷帽大行,幂篱之制渐

穿胡服驰骋:长靴长裤搭窄袖短衫

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骑马出行成为唐代一种社会风尚,男子出席隆重场合都要骑马,贵族女子也不甘落后。据史料记载:李渊之母独孤氏,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李治之母长孙氏都是鲜卑人。鲜卑女子在其氏族中向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有参政的习惯,她们视骑马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有胡族血统的宫廷贵族妇女首先带来一股“胡风”。

马卉介绍,从这四件骑马女俑中,我们可以发现唐代女子骑马的“标配”装束,除了一顶帷帽,还有长靴、长裤、窄袖短衫等胡服打扮。穿靴子便于骑乘,上马时脚不磨脚,因此成为骑马必备装备。《中华古今注》记载:“靴者,盖古胡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取便骑乘也。”李白《对酒》诗中“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即描绘了年方15岁的吴姬穿着时尚红锦靴的情景。

为适应妇女骑马的需要,干净利落的长裤、窄袖短衫的胡服打扮也随

之流行。马卉解释,因为穿裙装不便于坠蹬骑马,所以女子同男子一样穿着裤装,展出的骑马女俑就个个穿着裤装。当时的裤子还是很时髦的,像旅顺博物馆馆藏新疆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骑马女俑,就穿着波点纹的长裤;朝阳博物馆馆藏女俑中,着裤子的女俑就有18人。她们的裤管长度不一,有的长及膝部,有的长及踝部,且裤管很宽松,有的裤管外侧还可以看到有开衩的痕迹。

“短衣、窄袖、翻领等为胡人服饰的元素。”马卉说,胡服是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乃至西域地区的舞蹈服装,同时,这种服饰还融入了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元素。《新唐书·五行志》称:“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帽,妇人则髻步摇钗,衫袖窄小。”即是对胡服的描述。在朝阳境内发现的唐代女俑中,充斥着这些服饰特点。与传统汉族的深衣大袖相比,胡服没有森严的等级性和政治性,装饰自由方便,穿着舒适,且男女混穿。它不仅形式独特新颖,而且相对比较贴身,有利于突出女性身体各部分的

曲线,因而具有无法抵挡的吸引力。朝阳孙则墓,便是高宗时营州已有女子着胡服的例证。

《新唐书·舆服志》记载,在唐玄宗时期,着胡服、戴胡帽、跳胡舞、听胡曲已成为一种时尚。正如元稹的《法曲》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大唐盛世,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开明开放的风气和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唐朝妇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拥有自己的天地,所以唐朝才出现了大量的骑马女俑。马卉介绍,“安史之乱”是唐代发展的分水岭,唐朝由此转衰,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了影响。“安史之乱”平定后,统治者的政策为之变化,转而反“胡化”,女着胡服策马驰骋的景象在唐朝中晚期甚至以后各朝代都再难见到。宋代以后,妇女受到种种制约,思想被禁锢,加之马匹数量的减少,所以骑马女俑渐渐消失。

(本文图片由辽博提供)

对辽墓面具检测发现—— 契丹人能熟练锻造合金

本报记者 商越 文并摄

近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54件辽代金属器检测发现,辽代面具多用金、银、铜三种金属原料制成,且结合热锻、篆刻、打磨、抛光、鎏金等工艺,印证了1000多年前的契丹人已经熟练掌握合金配比,冶金技艺达到一定的水平。

辽代面具 分男相、女相和幼童三类

辽代有用金属覆面、编织金属丝网尸身的特殊葬俗,所以金属面具是辽代墓葬遗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王贺向记者介绍,所谓“覆面”,即人死后直接掩盖在死者面部的覆盖物。其材质主要有玉石、蚌壳、丝织品、金属等种类。

从目前考古出土实物来看,辽代面具多用金、银、铜三种金属原料制作,大致有金面具、银面具、铜面具、鎏金银面具、鎏金铜面具、金丝面具。面具的使用对象不仅有男女性别之分,即男相、女相面具,还发现有幼童面具,如内蒙古上烧锅辽墓5号墓就出土了幼童面具。

辽代金属面具有哪些用处呢?王贺说,目前学界主要有3种观点:一种认为面具的意义是出于保护死者避免恶灵伤害,即强调面具在宗教中的遮蔽功能;另一种认为面具是保护尸体并粉饰死者;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面具应是“亡亡者之魂”,强调了面具在葬俗中的宗教功能。

千年前 鎏金工艺应用广泛

本次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析了4件辽代金属面具,即小喇嘛沟一号辽墓出土的1件鎏金银面具、建平县博物馆馆藏的1件金属面具(原器物登记信息其材质为铜面具),另两件为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馆藏铜质面具。

4件金属面具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因此样品微量采集就在残损处进行。通过金相组织显微观察,发现4件面具均为热锻成型。制作技术应是先铸造成不同材质的金属薄片,然后经过反复热锻工艺制出大体形状后,再经工具进一步锤揲、篆刻出细节特征。

之后,考古人员又对4件面具的成分进行检测分析,结果发现面具的合金材质并不相同;两件喀左博物馆馆藏面具,为纯铜材质;建平县博物馆馆藏辽代面具,是添加了铜的银铜合金,但银含量比例多,因此应更名为银面具。由于合金中铜的化学性质较活泼,在空气中首先发生腐蚀,因此形成绿色锈蚀物富集在面具表面,形成了铜面具的外貌特征。而小喇嘛沟出土的面具是高银低铜合金,银的含量较高,考古人员还在其表面发现了鎏金工艺。

王贺解释说:“我们在面具金层中发现了汞元素,并且分布较均匀,这与文献中提及的鎏金样品中汞的分布状况相同。再结合微观检测,可以判定小喇嘛沟出土的面具的金装饰层是采用金汞齐火法鎏金工艺制作的。”

中国古代,金汞齐火法鎏金工艺是先把锻成薄片的金箔剪碎,放入坩埚加热至400℃后倒入汞,通过搅动使金、汞相溶,形成金泥,然后将金泥均匀地涂到器物上用炭火烘烤,金泥中的汞在烘烤中蒸发,器物表面上只留下黄金,再经刷洗、压光后完成鎏金工艺。“整个鎏金过程中,金属承受热会挥发,如吸入汞蒸气,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王贺强调,因此进行古法鎏金的工艺操作时,要特别注意通风,



小喇嘛沟辽墓出土的鎏金银面具



建平县博物馆馆藏的辽代银面具



喀左博物馆馆藏的辽代铜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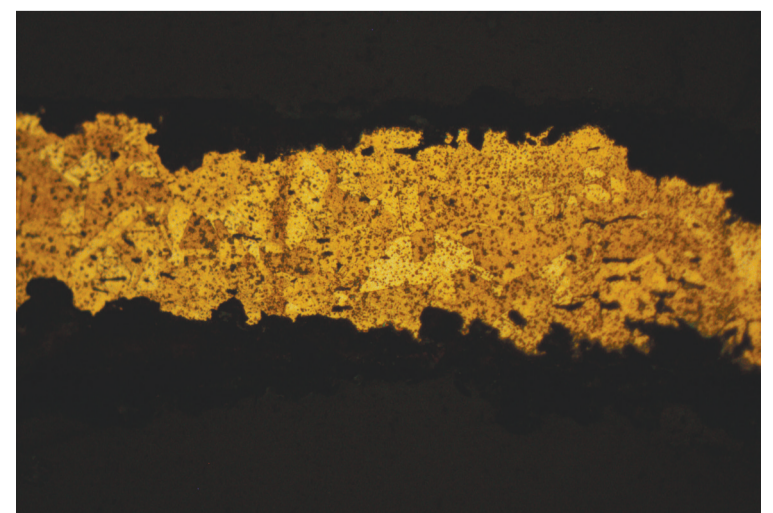
以避免吸入汞蒸气发生中毒。

出土铜及鎏金铜面具 数量最多

据初步统计,目前出土的辽代金属面具,铜质及鎏金铜面具的数量较多,银面具次之,金面具最少,仅个别墓葬有出土。

王贺介绍说,金、银材质面具体现了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但受金属材料稀缺性的限制,一些贵族家庭也采用铜质或者铜鎏金材质以达到金的视觉效果,替代金银面具。而建平县博物馆馆藏的银面具中添加较多铜的原因,也可能是在满足制作工艺需要、获得银的金属外观的条件下,添加一定量的铜来节省银料。

记者了解到,此次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54件辽代金属器进行科学检测分析,共包括29件铜器、17件银器、8件铁器。考古人员发现,辽代铜器的制作技术大体延续了唐代的工艺特征。金装饰工艺使用较为广泛,器物材质除了青铜(含锡、铅、锑)、纯铜外,还发现了较多黄铜器。银器的鎏金工艺应用成熟,尤其是贵族墓地,金属器物的加工工艺更为精细,器物的连接工艺已达到较高超的水平。而铁器样本的检测结果表明,辽代铁器均属于生铁冶炼体系,这属于中原地区特有的制作技术。可见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



辽代金属面具在金相组织显微镜下的放大图